

达尔富尔危机：中国外交转型的挑战与契机

王 猛

【内容提要】作为中国周边战略延伸地区的一次重大危机，达尔富尔问题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在苏丹的重大海外权益使中国的危机应对再次具有了实质性内容和主动色彩；参与大国博弈时所凸显的困境和危机推动了中国对既往政策的初步调整；中国在处理达尔富尔问题时表现出来的积极变化，是中国在战略机遇期维护自身利益边疆的前奏，中国和伊朗近期签署的长期能源合作协议，成为外交政策调整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信号。

【关键词】中国；中东政策；达尔富尔危机；转型

【作者简介】王猛，1971年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邮编：710069）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05）06-0035-06

2005年1月9日，在乌干达等苏丹周边国家领导人、美国国务卿、中国政府特使的见证下，苏丹政府与反政府武装在肯尼亚签署了全国和平协议，联合国将部署一支维和部队监督协议的执行情况。无论该协议能否平息苏丹国内的权力和资源之争，它所反映的苏丹国内政治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变化，对转型中的中国外交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在全球布局层面，虽然在苏丹利益的总额和权重还不太大，但它却昭示了中国外交从此永远无法回避的一组课题。两张弃权票的使用既是合作也是反对，是对两难处境的被动回避，也是在危机状态下的主动追求。这种在操作层面上依然属于“撞击-反应式”的被动外交，却显现出对以往“战术超脱”策略的某种突破，成为中国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边疆的序曲和前奏，标志着当代中国在周边战略延伸地区寻求权利和义务平衡的最新努力。

一 现代政治视野中的苏丹社会和达尔富尔危机

苏丹国土面积250万平方公里，大约有600多个部族，在3400万的总人口中，阿拉伯人约占39%，全国71%的居民信仰伊斯兰教。苏丹社会长期贫穷、动荡、孤立，其所坚持的极端宗教主张即使在伊斯兰世界也仅得到伊朗的同情和支持，九一一事件前苏丹甚至是国际恐怖分子的主要训练基地之一。长达22年的南北内战造成200多万人丧生、400万人流离失所，仅在1988年就

有25万人饿死，外债高达140亿美元。但近年来，苏丹的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借助飞速发展的石油工业，经济增长率持续几年高居北非六国之首，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新兴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巴希尔总统在和议长图拉比的权力之争中胜出，其内外政策趋向温和与务实；随着石油利益分享、国家权力分配以及独立公决等难题的渐次解决，棘手的南苏丹问题开始逐渐显现和解的曙光。丰富的石油资源对苏丹来说本来是一件幸事，然而“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攫取石油的利益目标使有关大国迅速介入达尔富尔危机，介入苏丹政府的内部治理。

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本质上是苏丹社会的治理危机。达尔富尔位于苏丹西部，同利比亚、乍得和中非接壤，土著居民分属80多个混居的部族，种族和教派矛盾错综复杂，是苏丹最贫困落后的地区之一，内外交困的苏丹政府也无能对之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因干旱导致的大规模阿拉伯移民迁入，使达尔富尔的人口从20年前的300万剧增到今天的600万，移民和土著居民争夺土地、水源的纠纷逐年增多。1994年，苏丹政府在将达尔富尔划分为南、西、北3部分的同时，也将阿拉伯人的政治特权扩大到西达尔富尔这一阿拉伯人占少数的地区，该地区脆弱的传统治理秩序随之崩溃。受境内外分离主义势力支持和加朗集团武装活动的示范带动，“苏丹解放军（SLA）”和“正义与公平运动（JEM）”这两支黑人武装，试图用解决苏丹南北内战的模式来寻求地方“自治”。SLA以政府未能阻止阿拉伯民兵袭击为由，于2003年4月攻击当地政府，烧毁一些阿拉伯村庄，杀死了一个阿拉伯酋长。随后，达尔富尔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黑人居民，被阿拉伯人占优势的苏丹政府指责为SLA的“第五纵队”。本来就拥有武装的阿拉伯民兵借此对西达尔富尔地区的许多黑人村庄进行“逐一、反复的洗劫，烧毁清真寺，掠夺牲畜，屠杀和驱逐当地黑人村民，为迁进阿拉伯人做准备。而所有这些行动，都得到了依靠石油收入装备了直升机、卫星电话和越野车的苏丹政府军的支援”。据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高级官员埃格兰德透露，在过去18个月中，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仅死于饥荒与疾病的人数至少达到18万，平均每个月死亡1万人。截至目前，达尔富尔冲突共造成约165万人流离失所，当地遭受冲突影响的人数高达220万人，是“目前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在围绕达尔富尔危机的国际较量中，美欧国家宣称“负有尽最大努力和通过任何方式”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道德责任”，以“人道主义”名义高调介入：政治上谴责苏丹政府的“种族灭绝”，推动联合国通过了6个有关苏丹问题的决议案，敦促苏丹政府加紧解除民兵武装，尽快与反对派组织达成全面协议；经济上，在宣布提供巨额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威胁制裁苏丹的石油业；军事上，美欧都对向苏丹南部派遣维和部队一事态度积极，分歧仅仅在于双方对国

金宜久、吴云贵：《伊斯兰与国际热点》，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页。

吴强：《苏丹危机挑战中国海外石油利益》，载《南风窗》，2004年9月16日，第270期，第24页。

吴强：《苏丹危机挑战中国海外石油利益》，第24页。

凤凰卫视消息：《联合国：苏丹非冲突死亡人数18个月18万人》，<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2005-03-15。

际刑事法院作用和地位的看法不同而已。作为相关的两大地区组织，阿拉伯联盟和非洲联盟则从地区安全的角度明确拒绝西方国家对苏丹的武力威胁，强调以整体力量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多次主持冲突各方在安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谈判，积极寻求非盟框架内能被各方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全力推动达尔富尔地区的政治和解进程。俄罗斯出于政治和经济双重目的，不仅明确表态支持苏丹政府，提前交付苏丹购买的武器，而且已经决定向苏丹派遣俄联邦内务部机关工作人员参与维和行动。日本则把参与“联合国苏丹维和行动”作为“最初的试金石”，经济为政治开道，借机加大参与国际事务的力度。可以说，达尔富尔危机已经成为近期相关国家和组织政治博弈的新舞台。

二 中国在苏丹的海外经济权益分析

随着中苏两国政府石油互利合作计划的开展，中国大批国有和民营企业纷纷进驻苏丹开辟市场，涵盖投资、贸易和劳务承包等各个领域，初步形成了以能源利益为主的苏丹海外利益区。

（一）跨国投资

从1995年至今，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CNPC，简称“中石油”）共计在苏丹投入约27亿美元，涵盖勘探、采油、输油管、炼油厂和港口等各个领域。到2003年1月底，中石油在苏丹1/2/4区项目的初期投资已经全部收回，目前每年收入近4亿美元；在6区、3/7区累计新发现地质储量6.95亿桶、30亿桶；拥有大尼罗河股份有限公司、喀土穆炼油厂、喀土穆石化厂各41%、50%和95%的股份。2004年，中石油计划在随后几年斥资31亿美元用于扩建喀土穆炼油厂、修建750公里的新输油管道以及红海沿岸靠泊30万吨油轮的苏丹港输油终端。与此同时，在苏丹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有数百人，主要来自浙江、山东、江苏、河北、北京、上海等地，种植业、饮料业、制鞋业成为他们获利较大的主要行业。

（二）双边贸易

中国是苏丹的最大贸易伙伴和石油的主要买家。1997年以来，在石油开发项目带动下，双边贸易量猛增。2001年，对华贸易占苏丹外贸总额的35%，其中对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55%，苏丹进口总额的14%来自中国。2004年，中苏贸易总额达25.2亿美元，中国从苏丹进口额为17.1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商品为原油。2004年1~4月，苏丹石油出口收入为10.057亿美元，装运的25艘油轮中有19艘发往中国。从长远看，中苏双边贸易的战略意义不仅在于对苏丹石油的长远

周吉平：《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走出去”的实践与经验》，载《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3期，第65页。

吴富贵：《苏丹，300美元开农场》，载《环球时报》，2003年11月3日。

2004年中国与苏丹的贸易额数据引自《国际贸易》，2005年第2期，第62页。

开发，更关系着中国的整个非洲石油开发战略。

（三）劳务承包

中国早在1981年就开始在苏丹进行劳务承包，1998年中国对苏丹出口的25%是由对外承包工程实现的。苏丹是中国外派劳务人员较多、营业额较大的国家之一。目前在苏丹开展承包劳务业务的公司有10家，公司代表、劳务人员及驻地医疗队共计约有5000人，主要承建石油化工、港口、电站、房建、路桥等工程，其他自发的经济活动还有经营房地产、办农场、制纯净水、做鞋、开中餐馆、编织工艺品、加工摩托车零配件等。从分布地域看，中国公司主要集中在苏丹中南部地区，个体劳动者则主要集中在喀土穆、恩图曼等大城市，西达尔富尔地区动乱对我国劳务人员的影响不明显。

三 达尔富尔：危机中凸显的中国发展困境

达尔富尔危机所凸显出来的诸多困境，无论是经济方面的权益拓展与安全维护，还是政治方面的国际社会参与及国家形象建构，都是中国在拓展利益边疆时必须妥善应对的严峻挑战，并因之而对正处于战略机遇期的中国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一）海外权益的安全困境

近10年来，在中石油的帮助下，苏丹不仅建成了上下游配套的石油工业体系，而且在1999年从一个石油进口国成为出口国，巴希尔总统为此发表讲话，感谢中石油集团，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中国人民。在苏丹石油出口4周年的庆祝会上，中石油副总经理吴耀文还被授予了一级双尼罗河勋章。然而时过境迁，贫穷、动荡而且有过殖民地历史的苏丹对中石油既崇敬又担心，害怕中石油垄断整个行业，害怕中石油成为新的国中之国。近年来，苏丹政府在石油项目的投标过程中明显不尊重中石油的市场主导地位，不仅多次蓄意损害大股东中石油的权益，而且有意引进其他国家能源巨头，力图改变苏丹石油产业的竞争格局。例如，在2003年苏丹3/7区管道项目的第二轮报价中，苏丹政府业主代表伊萨维用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简称“中石化”）的价格（1.9亿美元）打压中石油（2.4亿美元），以授标为诱饵让中石油过早暴露自己的真实成本和价格承受底线，致使中石油高不成低不就，以第一大股东身份也仅获得A标段中的240公里。在泵站项目的招标上，中石油本来报出最低价1.87亿美元，但苏丹政府代表认为中石油漏报了一个容器，强行为其加上450万美元，致使中石油的报价比紧随其后的意大利公司高出350

吴强：《苏丹危机挑战中国海外石油利益》，第24页。

吴富贵：《苏丹，300美元开农场》，载《环球时报》，2003年11月3日。

王弘：《双赢之路——CNPC苏丹石油项目启示录》，载《世界石油工业》，2001年第3期，第25页。

万美元，结果后者中标，而该容器的实际价值仅为60万美元。

近年来，中石油在苏丹的利益经受着内外两方面的损害。先是在2003年面临苏丹国家石油公司的合纵连横有意打压，不但在招标过程中所获不多，甚至连第一大股东的权益也得不到保障，项目所得与自身实力简直不成比例，坐看马来西亚公司成为3/7区块工程招标的最大赢家。2004年起又面临着国际社会对苏丹石油业随时可能的制裁以及国际石油巨头们的虎视眈眈。1556、1564号决议都将威胁制裁的矛头直指苏丹的石油工业。事实上，曾在20世纪80年代勘探过苏丹6/3/7区块的美国雪佛龙公司，就一直在渴望重返苏丹。因此，达尔富尔问题对中国在苏丹利益的安全内涵不仅是即时的，而且是长远的、多方面的。

（二）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错位困境

虽然实施“走出去”战略时很幸运地适逢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态势，但那些法治秩序可靠国家的资源早已名花有主，中国的能源企业只能进入那些“高风险”国家，国有化运动、所在国的战争和内乱、资金转移、税收和租金等政治风险因之变得无法回避。独立后的苏丹共发生过4次成功的政变，而且几乎在每一次的政变、革命或“民族主义”运动之后都发生过国有化运动，先后没收过30多家外国公司的资产，而最近的一次政变就发生在不太遥远的1989年。就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挑战而言，我们缺乏的不仅是应对的手段和工具，更缺乏应对的意识和思维习惯。对于西方跨国公司的扩张历史，我们往往从授受方的角度批判它们的侵略与掠夺，而没有从跨国公司方的角度来理解它们在海外经营的艰难以及运作安排上的良苦用心，笼统地认为世界现代史就是一部跨国资源掠夺的历史。现在看来，这种传统思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我们从海外经营的角度去理解、学习如何“走出去”做生意，阻碍我们深层次地领会跨国公司的海外经营技巧以及海外拓展所需要的国际制度环境。

这种困难处境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公司自身跨越发展的角色换位；二是总体阶段上与发达国家的代际差距。一方面，CNPC已经发展成跨国公司，在苏丹的石油投资就有可能被苏丹人认为是经济殖民，相对应的石油资产也是被“外国人”占有的资产。长期以来，因中国与苏丹政府的密切关系，南部加朗集团视中国为巴希尔政府的后台，指责中国支持苏丹政府与之打内战并攫取南部地区的石油财富。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利益追求往往带有激动人心的意识形态包装，而我们目前所追求的却仅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由于在技术和环保方面的差距，日益增多的海外经济拓展很难让所在国的民众心悦诚服，不时会遭遇一些非理性的抵制活动，发生在西班牙埃尔切的烧鞋事件就是一个突出例子。

（三）参与国际社会的方法困境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特定身份，中国一直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政策。但当中国企

任鹏宇、王永增：《两大石油巨头海外打响遭遇战》，载《经济参考报》，2004年6月28日。

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开拓国际市场时，这种政策就有必要注入新的内涵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在苏丹政府“用石油收入武装军队和阿拉伯民兵、驱逐西达尔富尔地区黑人、制造国际人道主义危机的一年多时间内，几乎没有受到来自中国的任何约束，最后受损的却是中国自身的利益”。

从实际情况看，虽然中石油是苏丹境内最大、资金最雄厚的外国公司，但因为缺乏稳定的外交保护，从中国石油投资中获益匪浅的苏丹政府出于制衡目的已经开始牺牲中石油的利益。

虽然美国草拟的联合国制裁苏丹决议案中把石油工业列为制裁对象之一，但中国最终并没有否决围绕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1556、1564号决议案，而是以弃权票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选择。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在维护自己权益方面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弃权票成了中国经常性的立场选择。这种长期的被动性表现，“虽然可能保护了我们某些直接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但却使我们的国际形象和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大打折扣，也因之丧失了许多表达我们声音的机会……不仅常任理事国中的其他大国习惯于明里暗里甩开中国搞磋商做方案，连许多原先寄厚望于中国的中小国家也会有失望和不理解”。

（四）国家形象的建构困境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科技等诸方面相互交往过程中，给其他国家及其公众留下的综合印象。作为一种可信度的标志，国家形象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而且反映出国人“对自身所处位置的重新定位，对国际社会的某种新的承诺，代表着历史的进步和一种深层次的文化思考”。在后冷战时代，以胜利者自居的发达国家积极推动“人权国际化”和联合国的“人权中心化”，将人道主义干预思想渗透到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与制裁行动之中。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对达尔富尔危机的介入，本质上仍然是后冷战时代国际社会“人道主义干预”行动的延续。

达尔富尔危机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建构提出了严峻挑战。在国家层面，要维护中国在苏丹的海外权益就不能站在苏丹政府的对立面，而要建构战略机遇期的国家新形象又不能和以“人权”为口号的西方国家发生正面冲突。这种压力在中国企业于海外的上市发行中已有先例。因为遭遇了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监督组织的强大阻力，中石油的上市一波三折，中石化也被迫将它们 在苏丹的6区块转给了不在美国上市的中石油。在个体层面，部分中石油在苏丹的职工的心态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他们觉得苏丹很贫穷，为中石油国际合作局的机关大楼比苏丹总统府气派而自豪，一个中国司机就因为强闯政府军的哨卡而被苏丹军人击毙。还有就是西方媒体的一些恶

详见陈志武：《中国跨国公司如何“跨国”》，载《南方周末》，2004年8月26日，第1072期。

吴强：《苏丹危机挑战中国海外石油利益》，第25页。

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75~276页、255页。

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第183页。

《在苏丹的中国银和江汉银》，载《江汉论坛》，江汉金桥信息网，<http://www.jttx.com.cn/cqi-bin/topic.cgi>。

意虚假报道。油田地区的艰苦环境和保投产的压力使得参与管道建设的工人们疲惫不堪，法新社因此报道说中国集中了2 000名廉价囚徒在苏丹建管道，这种歪曲的报道在世界各国制造了很坏的影响，巴黎机场就因担心囚徒混入而不允许从苏丹去欧洲出差的中国工人出关。

四 达尔富尔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危机意蕴

达尔富尔危机威胁到了中石油在苏丹的现实利益，但却不能仅仅将之看做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时遭遇难题的一例个案，它是中国在拓展利益边疆时众多挑战的一个缩影。具体而言，中国对非洲石油资源的开发不仅有助于减轻对中东石油超过六成的依赖，更对促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传统合作关系的转型有着特殊意义。联合国关于达尔富尔决议的通过，意味着“内政问题应由苏丹政府自己解决”的中国式立场事实上已经被放弃。而苏丹问题的国际化，不仅将损害中国的海外石油战略和经济安全，更深远地，它将威胁到中国的周边安全。

美孚石油帝国的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外交工作对海外权益保护的重要作用。洛克菲勒在《回忆随笔》中说：“给我们最大帮助的，就是华盛顿的国务院。我们的大使、公使和领事们协助我们开辟了通往新的市场的道路，这种市场一直延伸到世界上最遥远的角落。”然而自2003年以来，中石油在苏丹遭遇多重挑战时显现出来的无助和无奈，凸显了长久以来中国外交工作与海外投资的多方脱节：不仅在对外的权益保护上欲振乏力，而且在对内协调方面也几乎无所作为。在2003年苏丹3/7区块的项目招标上，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受传统观念、权限以及经验等因素的制约，不仅对苏丹政府合纵连横的打压行为难以施压，即使在国内企业之间的协调方面也仅是将之转给商务部了事。在“责任不可回避”的新时代背景下，“苏丹达尔富尔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它是一个契机，足以证明一个新理念：中国在海外大举投资时只考虑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资金、同业竞争等问题仍远远不够，外交部门和外交理念更需要进行改造”。

问题的另一面随之即来：如何对待我们传统的国际联系？如何使用我们相对有限的外交资源？如何与第三世界国家构筑新的合作平台？下面的几组对比也许值得我们关注。数年来，中石油在医院、学校、水井等公益事业上累计投资2 000万美元，而在同期，美国和以色列向南部反政府武装秘密资助了大约2 000万美元，并为其提供军火支持；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道主义危

周劲松、赖泽武：《工作在苏丹》，<http://www.bo95.nease.net/sudan.htm>。

[美]彼得·柯利尔、戴维·霍罗威茨著，劳景素译：《洛克菲勒王朝》，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26页。

任鹏宇、王永增：《两大石油巨头海外打响遭遇战》，载《经济参考报》，2004年6月28日。

吴强：《苏丹危机挑战中国海外石油利益》，第25页。

吴强：《苏丹危机挑战中国海外石油利益》，第24页。

机加剧以来,截至2004年8月中旬,中国政府向苏丹提供了大约1 000万元人民币的救援物资,而美欧则分别准备提供9 500万美元和1亿欧元;苏丹政府曾向中国购买了12架歼7改进型战斗机,但对新购买的12架米格-29战机的性能和提前5个月交货表达了双重满意。虽然许多非洲国家曾把中国视为进步盟友和一支抗衡西方的力量,但却认为目前“中国参与非洲事务纯粹就是一宗大买卖”。

五 达尔富尔: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型契机

“在邓小平之前,毛泽东拒绝接受国际体系的规则,并试图推翻它,通过革命谋求变化。毛泽东的外交政策以反对超级大国的坚定立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密切关系、与国际组织相对孤立的状态以及自给自足的经济著称。相比之下,中国现在对待双边关系、多边组织和安全问题的态度显现出前所未有的灵活和老练。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近几届领导人打破孤立状态、重塑形象、保护和增进国家经济利益并加强安全的努力。”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对中东政策调整的原则和策略,就必须体现对中国国家利益、大国关系以及对伊斯兰国家和人民的感情尊重这3个因素的综合考虑和平衡。

苏丹达尔富尔危机的全面国际化,在给中国海外石油利益投下阴影的同时,也使中国外交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和保护手段。外交部发言人就认为安理会确实需要通过一项新决议以促进达尔富尔危机的进一步解决,但其中不应包括制裁的内容。常驻联合国的王光亚大使在1564号决议通过之后断然表示,不存在中国在苏丹企业利益受损害的问题。这种外交姿态的背后显示出了某种无需言明的自信和安排。因此,无论是出于积极地保护自身利益还是消极地避免被边缘化,中国都应该也需要有所突破地正面回应联合国关于在苏丹南部部署维和部队的决议案。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仅2004年中国就有845名军人在8个联合国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中国在苏丹以能源为主的海外利益需要加以切实的保护。

国际舞台上的较量,既展现在经济、军事等硬权力层面,也包含有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等“软权力”内容。那么,在综合实力还比较有限的情况下,当代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是否对其他国家具有心理和道德上的说服力?从中东地区的实际情况看,不少国家曾经是西欧国家的殖民地,与昔日的宗主国也一直保持着政治和经济关系,美国因富裕及其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影

霍华德·福伦奇:《中国在非洲:完全是贸易,没有政治累赘》,载《纽约时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4年8月10日。

Evan S. Medeiros and M. 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Nov./Dec. 2003. 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2004年9月21日的答记者问,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3/30/content_1392757.htm。

新华网北京11月3日电:《联合国官员:中国和世界在维和行动中实现双赢》,

响力而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中国尽管缺乏这种传统关系和经济力量，但也并非在“软权力”资源上无牌可打。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核俱乐部成员、作为新兴经济区域的市场吸引力、一直对众多发展中国家有着深刻影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反恐”的话语霸权时代对国际多边主义和经济外交的坚持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中国坚持正义的基础。因为同中东地区各个国家的友好关系，中国在中东乃至全球事务中有着广阔的回旋余地。具体而言，以色列给予中国的理解和许多实质性帮助、阿拉伯世界对中国在阿以冲突中立场的赞赏、20世纪80年代中国与两伊的友好关系、90年代中东国家对中国打破西方制裁和孤立的支持，伊拉克战争后中国人质在伊拉克所经历的旋抓即释……都无不体现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软性影响力。英国广播公司最近的一项调查为此做了最好的注解。新华网的结论是：“国际民调显示：中国形象良好，比美俄更得世人心。”

六 结语：走向世界大国的自觉和自信

总体上看，中国对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在冷战期间呈现出强烈的政治利益需求和激进空洞的特点，而在伊拉克战争以前的后冷战时期却显现出某种超脱和功利的色彩。然而，随着对中东地区能源依赖的加剧，因经济和宗教联系而逐渐涉足中东的中国，注定必须在独立自主的同时，以合作求发展、以合作求和平，注定必须审慎反思自己的总体外交资源及其使用选择：作为一个正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发展中国家，在危机时刻和危机地区应该如何权衡和取舍自身的各种利益；作为一个认识到自身利益和责任的经济大国，在与相关国家交往时该怎样确定自己的角色内容；作为一个综合国力还比较有限的新兴大国，如何在新的斗争舞台上进行外交工具的选择和“软权力”的建构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与伊朗于2004年末签署的巨额能源合作协议，对双方而言都显现出一种深思熟虑的战略意图，既是对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海湾石油格局事实上的主导地位回应，也是对中伊友好合作发展历史的延续。伊朗学者认为此举“动摇了地缘政治之舟……无论美国多么不安，中国强势进入中东和里海能源市场的格局已是既成事实”。

因此，如果说伊拉克战争是一个句号、达尔富尔危机是一个逗号的话，与伊朗的能源合作就是中国中东政策转型中的一个叹号。在从政治大国走向经济大国、从地区性大国走向世界性大国时，中国越来越展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自觉和自信。历经伊拉克战争和达尔富尔危机考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11/03/content_2174356.htm。

该调查显示，中国在世界人民心目中形象良好，4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是积极正面的，大部分受访国家的民众同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有利世界。<http://news.xinhuanet.com>，2005-03-07。

详见唐志超：《中国伊朗正常合作 美国神经过敏》，载《国际先驱导报》，2004年11月12日。

验的中国外交，在转型过程中折射出来的方向性思路和侧重点，凸显了短期对策和中长期战略之间的内在衔接，并在处理与欧盟、东盟关系时表现出期待许久的、令人赏心悦目的大气和纵横捭阖的风采。

[收稿日期：2004-12-30]

[修回日期：2005-04-30]

[责任编辑：谭秀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站<http://www.iwep.org.cn/> 制作